



下

上海近代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近代史

刘惠吾 主编

朱 华 苏智良 编写
崔美明 孙果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136440

责任编辑：张哲永 王少如

封面设计：赵文奎

上海近代史(下)

刘惠吾 主编

朱 华 苏智良 编写
崔美明 孙果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光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 插页：7，字数：380 千字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400本

ISBN7-5617-0209-4/K·025

定价：平 3.70 元
精 4.60 元

DL 34/11

目 录

第九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上海	1
第一节	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	1
第二节	列强势力的消长	11
第三节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	24
第四节	上海工人阶级的成长	34
第五节	新文化运动登场	39
第十章	新纪元的开端	50
第一节	从“五四”到“六五”	50
第二节	反帝爱国斗争的继续开展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59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69
第四节	国共两党在上海的早期活动	75
第十一章	革命运动高涨和军阀混战的年代	82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上海	82
第二节	军阀争夺上海的江浙战争	90
第三节	二月罢工	100
第四节	五卅风暴	105
第五节	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和临时法院	116
第六节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继续发展	123
第十二章	在北伐军东进的日子里	134
第一节	上海自治运动和工人第一次起义	134
第二节	收回租界声中的上海租界	143

第三节	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147
第四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55
第十三章	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166
第一节	国民党在上海的反动统治	166
第二节	大上海计划和收回会审公堂	178
第三节	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斗争	186
第四节	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	195
第五节	其他政治组织在上海的活动	206
第六节	华人参政运动的继续发展和《费唐报告》	214
第十四章	第一次淞沪抗战	223
第一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223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	233
第三节	淞沪血战	240
第四节	日军暴行和《淞沪停战协定》	249
第十五章	国难声中的上海	258
第一节	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和抗日民主运动的 曲折发展	258
第二节	文化战线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270
第三节	民族资本的衰败和官僚资本的膨胀	279
第四节	洋场黑幕与社会风气	288
第十六章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297
第一节	法币改革	297
第二节	救国会的成立	303
第三节	七君子之狱	312
第十七章	第二次淞沪抗战和上海的沦陷	319
第一节	八一三事变	319

第二节	淞沪会战的失利	328
第三节	一场空前的浩劫	334
第四节	上海部分工厂的内迁	341
第十八章	孤岛时期	348
第一节	孤岛的地位	348
第二节	大道市政府与伪上海特别市政府	355
第三节	汪伪在上海的活动	362
第四节	错综复杂的斗争	371
第五节	腥风血雨中的畸形繁荣	381
第六节	孤岛文化	390
第十九章	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	398
第一节	租界的结束	398
第二节	日本侵略者的恐怖统治	406
第三节	日伪掠夺下的社会经济	412
第四节	奴化教育和毒化政策	423
第五节	不屈的人民	431
第六节	末日临近的汪伪政权	437
第二十章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	442
第一节	国民党对上海的劫收	442
第二节	“天还未亮”	449
第三节	美货泛滥	459
第四节	和平的呼声	464
第二十一章	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474
第一节	恶性通货膨胀与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	474
第二节	争取生存的浪潮	480
第三节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486
第四节	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494

第二十二章 黎明前的较量	501
第一节 人民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501
第二节 金圆券与“打虎”	508
第三节 国民党在上海的最后挣扎	518
第二十三章 上海的解放	527
第一节 解放上海之战	527
第二节 上海的新生	535
附录一 大事记(1914—1949 年)	546
附录二 中共上海地方领导机关沿革表	563
附录三 民国时期上海地方统治机构沿革表	565
附录四 外国人名译名表	567
后 记	571

第 九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上海

第一节 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

1913年8月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指使其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疯狂镇压革命势力，摧残上海人民在辛亥革命中取得的民主成果，全面实行反攻倒算。

郑汝成海军出身，虽不属袁世凯的北洋嫡系，但对袁效忠，镇压革命不遗余力。他一上台，即勒令解散商团，李平书、叶惠钧等商团领导人被迫出亡日本。1914年2月，郑按照袁世凯政府停办地方自治的命令，将上海市政厅和闸北市政厅接收并改组为官办的上海工巡捐总局和闸北工巡捐分局，任杨南珊、朱寿丞为局长^①。同年5月，辛亥革命期间建立起来的各初级审判厅尽被裁撤。在这之前，袁世凯已令特派江苏

^① 1918年，上海工巡捐总局和闸北工巡捐分局分别改名为沪南、沪北工巡捐分局。

交涉员杨晟兼任上海观察使。同年6月，正式恢复道的官制，观察使改称沪海道尹，辖上海、宝山、嘉定、松江、奉贤、金山、南汇、青浦、川沙、崇明、海门、太仓十二县，道署设在上海。但是，上海县知事^①真正的上级却是袁世凯更为信赖的驻沪最高军事长官——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镇守使有便宜处理上海地方内务、警政之权，且直属中央指挥，不受江苏都督节制。这种分而治之的制度种下了日后军阀争夺上海的祸根^②。

当时，各地反动统治者秉承袁世凯意旨，大肆捕杀参加“二次革命”的人士。各地讨袁军的中下级军官离开队伍后多不敢回乡，许多人逃来上海租界躲避。袁世凯获悉这一情况后，命令郑汝成悬赏缉拿，并派米占元为江宁驻沪侦探，与郑配合，力求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此外，各省也派出侦探来沪捕人。由于租界当局不允许中国官厅自行入租界搜捕，郑汝成、米占元等便用收买叛徒、打进内奸的办法，暗中刺探革命党人的内部情况，然后伺机下手。他们唆使叛徒伪造黄兴等人的手令，诬骗租界内失去联系的革命党人去外地工作。这些人一出租界，便立即成为军警、暗探的猎获物。若诱捕不成，他们就遣刺客暗杀。这类诱捕暗杀事件，几乎日有所闻。有些侦探为了领取赏银，甚至还诬陷无辜市民。但郑汝成觉得诱捕暗杀总不及直接进入租界抓人方便，因而建议袁世凯令外交部向外人交涉，争取外人在中国军警入租界捕人问题上有所让步。

① 1913年5月，县民政长已按袁政府的命令改为县知事。

② 这个制度主要是为了牵制江苏都督冯国璋。这时冯已有“功高震主”之势，袁对他很猜忌。

领事团方面早已摸清袁世凯为剿灭革命党人而不惜出卖主权的心理，决心利用租界捕人权问题，同他作一笔政治交易。因此，在“二次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领事团对袁政府表面颇示赞助，但对官厅入租界捕人问题则坚决不肯通融，有时还故意让捕房抓人而不引渡。法租界当局甚至扬言要缉捕在界内从事暗杀的袁氏爪牙，以致中国侦探一度不能匿迹法租界。与此同时，他们正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租界扩张的要求。法国公使康德首先照会北京外交部，要求解决所谓上海中法警察权划分问题。外交总长孙宝琦迎合袁世凯的心理，向袁献策说：“比年以来，乱党出没租界，倚为护符，虽经官府指名索交，而外人辄以国事犯为辞，不允拿解，……今法使既阳以划清警权为名，而阴行扩充租界之实，计不如因势利导，承认其已辟之路，归法国警察管辖，而于界内藏匿之乱党，要求其分别驱逐拿交，以清乱源，而弥隐患。”^①袁世凯即予“嘉纳”，令外交部与法使会商，并电令郑汝成会同警察督办萨镇冰及特派江苏交涉员杨晟与法租界当局谈判“划清警权”的具体办法。

郑汝成等心领神会，即于1914年2月提出如下方案：除方浜路至斜桥、肇周路一带外，法方所要求的其他地区均可交出，作为交换，法方应准许中国军队自由持械通行法租界，中国侦探亦得在法租界捕拿逃犯；会审公堂不得由领事独断。随后，上海县知事洪锡范召集绅商讨论此事。绅商们不敢表示

^① 转引自董枢：《上海法租界的多事时期》，载《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1年第4期。

反对法租界扩张,只是主张扩张的范围应小些,并要求公董局设立华董。但在谈判中,法国当局只答应帮助捉拿“国事犯”,不肯打破禁止中国军警自由入界捕人的惯例。袁政府只得让步。4月7日,北京外交部与法使就所谓“国事犯”问题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是:法租界当局应驱逐藏匿于界内的“国事犯”;在法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从事革命活动者,应按现时成约及惯例办理;犯有其他罪行的国事犯应交给中国地方官。次日,杨晟与法领甘世东秘密签订《法租界外马路警权协定》十一条,将法租界以西迄徐家汇的整个越界筑路地段(即所谓“外马路”)全部划归公董局管辖。这样,法国殖民者就通过袁世凯政府,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以划分警权为名扩张租界的阴谋。

这笔肮脏的政治交易做成后,法租界当局立即改变态度,大力协助郑汝成的搜捕活动。5月14日,郑汝成获悉,有党人与白朗军^①成员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共谋举事,即派出军警配合法捕房,在该处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了70多人。法捕房随即将其中10人引渡给郑汝成处决。

1914年7月,《划分警权协定》公布生效。两个月后,北至长浜路(今延安西路),西至徐家汇,南至斜桥、徐家汇路的广大地区全部归公董局管辖,法租界的面积一下子扩大7倍,达到15,150亩。作为这项协定的一个附带条件,公董局增设两名华董。公董局先拟聘虞洽卿、陆伯鸿担任,因虞坚辞不就,又改聘曾任县民政长的吴馨。陆、吴两人于9月间上任。虽然一般认为这是上海租界最早的华人董事,但实际上他们

① 白朗军是当时活动于湖北、河南、陕西、安徽等省的一支反袁农民起义军。

连出席董事会议事的资格都没有。

法租界扩张得手后，公共租界方面也加快了扩张的步伐。7月以后，报纸披露了公共租界将向闸北扩张，与官府协议即将达成的消息。闸北市民多次开会商议对付办法，并派代表赴京请愿，但最后还是屈服于袁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淫威。1915年3月，工部局公布杨晟与领事团商定的推广租界草案，其要点为：（1）北至沪宁铁路，西至虹桥路，南至徐家汇的地区全部划入公共租界；（2）工部局暂设华人顾问部，以后再设华董；（3）逃入租界的“乱党”由工部局从海道押解出境，但“有责任之华官”指明的重犯应即引渡。这个草案发表后，闸北绅商有的请求派代表参加有关谈判，有的则表示沪宁铁路车站不可划入租界，但总的说来，他们对这次公共租界扩张的反应是比较软弱无力的。只是由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各帝国主义国家对租界扩张多持冷淡态度，对此事最关注的英国孤掌难鸣，无法使公使团赞同它的计划，这笔肮脏交易才未能最后拍板。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等人虽然离开了上海，但隐蔽下来的革命党人仍然不时活动。如1914年1月，他们暗杀了曾勾引工部局占领闸北、破坏讨袁军事的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粹方。9月间，江宁驻沪侦探米占元受炸弹袭击，险些丧命。但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再加上大批叛徒、内奸的破坏，多数反袁活动都失败了，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如1914年4月，毕良臣等对袁军进行策反，事为北洋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所悉。杨便派爪牙更名与之联络，将毕设在十六铺的机关彻底破坏。5月底，一批革命党人在小沙渡设立秘密司令部，计划在沪西、宝

山和海门举行起义，未及行动，机关便被破坏，枪械、旗帜、印信等全部落入军警手中。

在接二连三的挫折和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面前，陈其美的追随者大多数不是变节，就是畏葸不前。郑汝成曾以“资遣回籍”为诱饵招降革命党人，报名受招者竟达一千数百名之多。卖身投靠袁政府，充当侦探、眼线残害同志者亦不在少数。还有些人则干起了黑社会的勾当，开设碰和台，当扒手，做拆白党，甚至明火执仗去绑票。一个叫黄佐卿的原讨袁军军官，还纠集士兵组织“打架团”，给二百元钱就会去杀害一条人命。

1914年7月，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重举民主革命大旗，并采取秘密结社的组织方式，在军队与会党中活动。与会党有密切关系的陈其美担任了总务部长。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即派出几百人回国策动反袁斗争。派往上海主持大计的是安徽人范光启（鸿仙）。范到上海后，积极在军队中建立联系，但他的活动很快被郑汝成发现。1914年9月中旬，郑汝成派刺客将范暗杀于葛罗路（今嵩山路）39号寓所，并破获范在军队中发展的组织，逮捕、杀害了200多人，使中华革命党在上海的力量受到重大损失。陈其美一度灰心丧气，转而经营东北，策动西南。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国人民迅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上海各界组织中华民国请愿会和国民对日同志会，宣布誓死捍卫国权。3月19日，上海留日学界代表、中华民国请愿会、国民对日同志会、进步党及各界代表数万人齐集张园，举行国民大会，反

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人民群众自发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许多群众聚集在公共租界内各日本商店门前，劝阻同胞入购日货。这些商店只得相率闭门。儿童们手持装有铁钩的竹杆，到处捣毁日货广告。沪宁车站前树立的日本仁丹大广告牌，也被人们破坏。市内到处有人散发抵制日货的传单。中外反动当局对此极为恐慌。淞沪警察厅在领事团的支持下，悍然宣布严禁市民散发传单。

5月9日，袁世凯基本接受二十一条，并加快了帝制活动的进程。中华革命党也加紧开展反袁斗争。9月上旬，袁世凯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刚刚在上海开张，就遭到炸弹袭击。10月中旬，陈其美由日本返沪，准备去西南策动反袁斗争。但上海的革命党人认为，驻沪陆海军中已有许多人倾向革命，加之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上海民情空前激愤，请陈留沪领导斗争。孙中山同意这个意见。陈其美遂在宝昌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5号设立机关，并将蒋介石、杨庶堪等召至上海。陈其美认为控制长江的关键在于海军，而海军受郑汝成统驭，郑又极为狡猾，难以对付，所以决定先设法消灭郑汝成^①。11月10日上午，郑汝成去日本领事馆祝贺大正天皇加冕，车至外白渡桥时，埋伏在附近的王明山、王晓峰突然冲出，炸坏汽车，用手枪将郑击毙。这时，巡捕已将他俩团团围住，却不敢上前。两人弃枪于地，从容被捕，不久就义。

郑汝成被刺杀后，袁世凯裁撤上海镇守使和松江镇守使

① 陈其美动员的方式也很特别。他挑选了百余人，每人发百元钱，要他们尽情寻欢作乐，把钱用完后再来领受刺郑任务。

两职，另设松沪护军使，令原兼任松江镇守使的杨善德兼任松沪护军使^①。12月，袁又加派北洋军第十师进驻上海，任该师师长卢永祥为松沪护军副使，以加强上海地区的反革命力量。尽管如此，陈其美指挥的中华革命党人还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起义。

当时，袁政府的“肇和”、“应瑞”、“通济”号三艘军舰停泊黄浦江。陈其美派人策反，很快得到“肇和”舰大多数士兵的响应，其他两舰中同情革命的人员也日益增多。袁世凯有所觉察，便令三舰刻日驶粤。陈其美遂决定于12月5日提前发难。具体的计划是：杨虎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带人占领“肇和”舰，然后炮击制造局；孙祥夫任海军陆战队副司令，带人占领“应瑞”、“通济”舰；市区的革命党人听到炮声后分头攻击制造局、警察局、电话局等处。是日下午，杨虎带着30多人乘汽艇顺利占领“肇和”舰，但孙祥夫带领的一队人却因未办出港护照，被巡警阻挡无法出发。6时，“肇和”舰向制造局开炮，炮弹落进了公共租界，制造局毫无动静。杨虎以为制造局已被攻占，命令停止炮击。准备攻打制造局的革命党人见只有“肇和”一舰发炮，炮声又很快停止，以为占领军舰的行动已告失败，不敢采取行动。其余起义者却在听到炮声后，按计划向各预定目标攻击。一路20多人带着手枪和炸弹，占领了十六铺淞沪警察厅第一区总署和工巡捐总局，但三小时后即被大队敌军赶了出来，死伤过半。其他几路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陆上的进攻完全失败，只有“肇和”舰仍在革命党人手中。是晚，

^① 护军使署初设在制造局原镇守使署内，1916年另在枫林路建立新署。

杨善德在制造局召开会议，决定用重金贿赂“应瑞”、“通济”两舰官兵去攻击“肇和”舰。当夜，10万元银洋从交通银行运上两舰，收买成功。6日凌晨，两舰突然向“肇和”舰开炮。杨虎猝不及防，弃舰撤退。陈其美收集残部，准备于7日晚间再举。事为敌探所闻，杨善德即下令彻夜严防。7日晚，革命党人攻击张华浜火药库，因敌人早有防备，又未得手。起义至此完全失败。是役，中华革命党损失惨重，被捕40余人，伤70余人，丧失枪械百余支，耗饷洋4万余元。这是一次脱离群众而又缺乏周密组织的军事密谋活动，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揭开了武装反对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序幕。

“肇和”舰起义失败后，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斗争仍在继续。同年12月中旬，上海《亚细亚报》再次遭炸弹袭击，被迫停刊。陈其美等又用巨款买通一些陆海军官兵，决定于1916年4月13日发动驻沪陆海军起义。到了那天，海军又不践约，未发炮。革命党人宋振欲登舰，被叛兵开枪击退，宋愤而投江自杀。陆军方面也因计划不周，数人被捕杀。起义再度流产。

1916年5月初，孙中山从日本返沪，发表讨袁二次宣言，并将中华革命党总部自日本迁到上海，指挥各地革命党人武装反袁。这时，袁世凯也加紧了对中华革命党的镇压，密令张宗昌^①以13万元的赏银暗杀陈其美。由于反袁起义接连失败，上海的中华革命党人经费耗竭。为了重振旗鼓，陈其美四出筹款。张宗昌探知这一情况，便派人以“鸿丰煤矿公司”名义托陈向日

① 张宗昌原是北满胡匪，辛亥革命后来上海，曾在陈其美手下任职，“二次革命”时背叛民军，投靠冯国璋。

商接洽贷款,允诺以贷款的五分之二赠陈。陈其美得款心切,中了圈套,于5月18日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机关被自称鸿丰煤矿公司代表的刺客杀害。凶手许国霖、宿振芳两人被法捕房捕获,后移送中国官厅从轻发落。陈其美遇难是中华革命党的一个重大损失。孙中山极为悲痛,以“君独契文,谓国可救,百折不挠,以明所守。疾疢弥年,未尝逸暇,我志郁伊,赖君实写”^①等文句,高度评价陈在“二次革命”以来的斗争业绩。此后,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完全停止了。陈其美部下30多人按照孙中山的命令去山东参加居正指挥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孙中山继续留在上海进行政治斗争。

袁世凯死后,上海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李平书、沈缦云、黄炎培、钱新之等,一度以为从此天下大吉,曾两次致电新任大总统黎元洪,要求裁撤护军使,撤走北洋军,结果却如石沉大海。孙中山起初对黎元洪也抱有某些幻想,一度命令各地讨袁军按兵不动,并派廖仲恺、胡汉民等北上与黎元洪、段祺瑞共商国事。但军阀政府悍然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决心联合西南各派势力,开展护法运动。1917年5月下旬,孙中山与章太炎联名致电唐继尧,劝他出师护法,随后又在哈同花园与海军总长程璧光共商海军护法问题。7月初,张勋复辟,上海各界人民纷纷举行集会,通电声讨。旅沪国会议员也致电冯国璋及各省,呼吁反对复辟。7月3日,孙中山在寓所召集章太炎、唐绍仪及一些陆海军军官开会,决定通

① 转引自朱宗震:《读孙中山〈祭陈其美文〉》,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